■ 红色记忆

1939年12月10日，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、政机关转移，他率领独立团，在莱芜西周峪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近战。战斗中，为掩护抢救战友，不幸中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7岁。

李曦晨：象牙塔里走出的抗战英雄

□ 本报通讯员 王静 张继才
本报记者 陈巨慧

他是天资聪敏的优秀学生，面对旧社会的种种腐败，中学期间就萌发了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意念；他是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，在共产党的指引下，迅速成长为抗日救国的革命先驱；他是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，面对严刑拷打，义无反顾地实现了“把牢底坐穿”的铮铮誓言；他是抗日战场上的一把尖刀，锤炼出了清河平原上的抗战劲旅……他就是临淄走出的抗战英雄李曦晨，一名年仅27岁战死疆场的革命者。

李曦晨

胶济铁路破袭战图画

优等生走上抗日救亡路

1912年元旦刚过不久，肆虐的寒风掠过鲁中平原，北方冬季特有的萧条感笼罩在人们心头。这个季节，地里没什么农活，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出门。

一阵婴儿的啼哭打破了临淄县敬信乡齐家终村（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齐家终村）的宁静，也给村民李意美一家带来了无尽的喜悦。李意美自幼熟读四书五经，后来家乡时疫流行，民不聊生，满腹经纶却无力帮助乡亲们的李意美便开始自学中医，济世施药，誉满乡里，成了四邻八村有名的儒医。

李意美为这个儿子起名李世光（后改为李曦晨），字梅秋。6岁那年，小曦晨就被送入本村的私塾念书，他天资聪敏，勤学好问，深得塾师和校友的赞许。11岁，李曦晨考入临淄县立闻韶小学，14岁又考入临淄县立初级中学读书。

在临淄县立初级中学读书期间，李曦晨成绩优异，急公好义，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常务委员。知识的增加，让他对一些社会问题开始了自我思索，面对当时为富不仁、豪强横行的现实，他痛心疾首，在一次班会上，他以“欢迎土匪”为题进行讲演，初步显露了他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意念。

1929年夏天，李曦晨考入益都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，学校早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，李曦晨的国文教师马石庵（又名马千里）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在师范学校，李曦晨接触到了进步书籍和共产党的教育。马老师结合教学，宣传进步思想，帮助李曦晨找到了旧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，让他耳目一新。他暗自下定决心，跟随老师，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于是，他参加了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和“左翼作家联盟”等进步团体，并很快成为核心人物，站在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前列。

1931年5月1日，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，李曦晨组织了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、省立十中、师范讲习所、商业学校的数百名学生“飞行集会”，进行“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”的宣传活动。斗争中，他入了党，随即担任中共益都县委青年部部长、四师党支部书记。

李曦晨不仅在校内团结进步同学，还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，同校内的工人建立了广泛联系。他以笔杆子做刀枪，写了一篇题为《福儿复仇记》的小说。这篇鼓动报仇雪耻的革命小说，一时轰动了全校，颇受师生、工友们的赞扬。

1931年九·一八事变后，中共益都县委指示，要在工、农、兵、学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。在这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，李曦晨指导李人凤、陈梅川等同志演出了抗日救亡的话剧，很受群众的欢迎。

1932年8月，中共益都县委发动郑母村农民暴动失败后，益都县委的同志遭受国民党县党部的逮捕。月底，团山东省委秘书马兰村代表省委来益都整顿党、团组织，成立了益都县党、团联合委员会（即临时县委），由李曦晨任书记，他立即重新整顿了十中党支部，建立了北官营党支部，还亲自负责创办了秘密革命刊物《赤锋报》，继续进行“团结抗日”宣传。

被捕入狱誓把牢底坐穿

1933年3月3日，因捕共队特务的出卖，正在益都卫街新华客栈召开党团主要干部会议的李曦晨被捕，从此开始了近五年的铁窗生活。

3月5日凌晨，李曦晨被从益都押到济南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，由军事法庭审讯。在国民党第三路军军事法庭，他身受各种严酷刑讯，始终以抗日爱国无罪来答辩，严守了我党的秘密，最后被判5年徒刑，交山东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。

1934年5月，李曦晨被转押到山东第五监狱。不久，他领导全狱难友为争取改善伙食和保障阅读书报的权利，开展了长达6天的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，被推为首任“犯人”伙食代表。国民党山东司法当局畏于他的斗争精神，又把他转到山东省政治反省院。到院不久，他又连续两次发动绝食斗争，强烈要求改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，同时对他的无辜判罪提出申诉。山东省政治反省院难以应付，又将他转押益都东关山东第四监狱。益都教育界师生和各界人士闻讯后，纷纷到狱中探望他，声援他的斗争。第四监狱管理人员怕出变故，又把他转回反省院。

国民党狱政当局看到李曦晨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出现反抗。于是又以“劫持群众，排斥训导”的罪名，加判5年徒刑，并采取了残酷的“流押”手段，先后将他押送到章丘、桓台、临淄、临朐、益都等县看守所，每处看押最长不过一月，使他疲于奔劳，不得安宁，妄图以此消磨他的革命意志。没想到，李曦晨仍利用流押机会，把革命真理到处传播。临朐县看守所所长越级为这位“有学识的爱国青年”向省司法当局鸣冤申诉，吓得山东司法当局第3次把他押回山东省政治反省院，再不流押他处。

1937年秋，日军逼近济南，山东省政治反省院迫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定，在监狱门口贴张纸条说：“谁想出狱，签个名即可”。但李曦晨等人不予理睬，力争无罪释放。又过了几天，山东省政治反省院的训导主任在逃走之前，跑来对李曦晨等三人说：“恁这三个不怕死的人啊！快走吧，什么手续也不用办了。”李曦晨、胡维鲁等三人才无罪出狱，实现了他“坐穿牢底”的誓言。

打响清河抗战第一枪

李曦晨出狱后，首先去寿光与中共鲁东工委取得了联系，并汇报了在狱中斗争的情况。鲁东工委立即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，并分配他到临淄发动群众，组织抗日人民武装。

李曦晨回到临淄老家后，先到临淄四区中埠村找到黑铁山特支书记李清贵，了解到临淄西关小学的李人凤、陈梅川、崔栋生和石家毛托村地下党员石潇江等同志，正分别酝酿组织抗日武装，他立即赶到西关小学，向李人凤、陈梅川现场传达了党组织关于发动群众、组织抗日人民武装的指示，李人凤、陈梅川齐声说：“好！好！要听共产党的，当机立断，立即拉起队伍打日本帝国主义去！”从此，李曦晨同李人凤、陈梅川等人，在临淄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熊熊烈火。

李人凤等人是临淄教育界的进步人士，他们不仅在学校有较高的威望，在社会上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特别是李人凤，在临淄是很有影响的人物。早年在益都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期间，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地下组织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。他在临淄第一小学、西关小学任教期间，教学认真，关怀学生，并教育学生将来要报效国家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临淄地区的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及爱国进步人士，纷纷响应党的号召，开展抗日活动。

想在临淄地区建立一支人民的抗日武装，当时存在着两大困难：一是国民党县长冯谦光称王称霸，不让共产党公开组织武装；二是窜来临淄的国民党蓝衣社分子王尚志和共产党争拉武装。有的同志对此顾虑重重，李曦晨有胆识有远见，他对李人凤等人说：“临淄的青年学生、教师、农民，已经受到一定的抗日救国影响。他们抗日心切，是抗战的主要力量，我们应该利用合法的形式，迅速把他们组织起来。‘蓝衣社’分子，来这里拉队伍，主要是抢地盘、发国难财，这必然和冯谦光矛盾重重，我们可以利用。”

随后，李曦晨等人着手准备在西关小学组织抗日武装。他们在组成化装讲演团四处宣传武装抗日的同时，对高年级学生进行使用武器的训练，并秘密收集枪支，为民团讲授游击战术。

这时，临淄县的国民党县长冯谦光已经将县民团和警察控制起来，自称“司令”，王尚志任“副司令”。考虑到单独筹建抗日武装的重重困难，李曦晨他们决定利用冯谦光和“蓝衣社”弱点，借用他们的名义，成立一支合法的、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青年学生抗日武装，并取名为“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”，队伍被编为冯谦光部的一个中队。

军训团的招募采用了招考的办法，公告一出，报名应试的多达800余人。为了保证队伍的纯洁性，李人凤等人亲自担任主考，将所熟悉的进步学生、教师和其他进步青年加以圈定录取。为了工作上的方便，李曦晨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军训团，当了青年学生们抗日救国的排头兵。

军训团成立后不久，周村、张店等地先后沦陷，此后，日军一部沿胶济线东进，临淄危在旦夕，取得枪支成了军训团最迫切的问题。恰好张店一部分蓝衣社分子携带40支汉阳造前来西关小学投奔王尚志，李曦晨等人提出了“借枪用以外出起枪”的要求，对方应允了。武装起来的军训团从此再也没有回临淄城。

1938年1月5日，李曦晨等人率军训团开往辛店车站以西的矮槐树村，对东犯的日军予以迎头痛击。这次战斗，击毙日寇冯队长吉田藤太郎，打死打伤鬼子10多名，缴获战利品一大宗，拉开了清河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。

巧妙斗争发展抗日根据地

矮槐树伏击战后，王尚志打起“国民革命军冀鲁游击区第二梯队”的番号，自任“司令”，要求统一整编部队。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李曦晨等人将计就计，答应接受王尚志的整编，军训团被编为王尚志部三大队，李人凤任大队长。这支年轻的人民抗日武装，依然掌握在我党的手里。李曦晨经常对部队进行抗日救亡的教育，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，教唱抗日歌曲，激发战士们的抗战热情。通过宣传教育，战士们进一步认清了王尚志等人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。

三大队成立后，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，深受群众欢迎，许多青年参加了三大队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。当时，鲁东工委在寿光牛头镇一带，益都中心县委在朱鹿一带，广饶县委在延家集一带，为了便于接受党的领导，三大队也伺机移动到了淄河东岸郑家辛一带。

1938年2月6日，李曦晨带领陈梅川、崔栋生到寿光，向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汇报工作，请求工委派骨干力量加强部队的领导。鲁东工委高度评价了他的工作，并指示广饶县党委派骨干和优秀青年加强临淄三大队。不久，中共广饶县委派共产党员岳拙园、吕乙亭、阎子愚、任圣符等人到三大队，鲁东工委派杨涤生到三大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。自此，党组织加强了对三大队的领导，部队战斗力越来越强大，士气越来越旺盛，驱逐蓝衣社分子的条件已经成熟。

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李曦晨配合李人凤，巧妙地解除了王尚志的特务分队和特务大队的武装。接着，又派人消灭了王尚志设在寇家庄的司令部，并将王尚志等人看押。为了执行国共合作和统战政策，没有制裁他们，而是将其驱逐出了临淄县境，纯洁了部队。不久，三大队建立了政治处，李曦晨任副主任。从此，完全按照我党的建军原则，对部队进行了军政、军民关系的教育，进一步加强了部队党的建设。到1938年6月，三大队由两个中队发展到10个中队，共1000多人，并建立了自己的小兵工厂、军医院和被服厂，成为我军一支生气勃勃的革命力量。

李曦晨和李人凤、陈梅川等创建的这支人民抗日武装，在战斗中诞生，在战斗中成长。他们与日、伪军斗，与国民党顽固派斗，有时一日数战。战斗赢得了胜利，部队得到了锻炼和武装。1938年6月的一天夜晚，为切断敌人的运输线，迟滞敌人的行动，李曦晨协助李人凤率7个中队在西起淄河车站，东至普通车站10多里的胶济线上，进行铁路大破袭。这次铁路破袭战，破坏敌人铁路10余里，炸毁火车头1台，毙、伤敌军30多人，打出了我军的威风。

李曦晨在做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，还十分重视地方党的工作。其间，他亲自主持举办了数期抗日积极分子训练班、党员训练班和区委书记、乡村支部书记训练班等，为党培训了大批干部。他讲课言语生动，深入浅出，学员们听了，印象深，记得牢，深受大家的欢迎。同时，他还经常深入南卧石、郑家辛、北羊、孔王、訾郭等村，对村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，进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，发展具备党员条件的同志入党，先后建立了南卧石、郑家辛、訾郭等农村党支部，为临淄地区党的建设和巩固发展临淄抗日革命根据地，作出卓越的贡献。

掩护战友战死沙场

1938年7月，三大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十团，李曦晨为政治处副主任。

7月下旬，为消灭盘踞在临淄城的国民党顽固派头子陈瑞符，十团从白兔丘一带出发挥戈南下，迅速包围了临淄县城。李人凤和李曦晨指挥部队攻城，经过五天的战斗，解放了临淄县城。为了宣传胜利，鼓舞群众，增强抗战胜利信心，李曦晨亲自动手编写《抗战新闻》油印报，接着又主持创办抗战刊物《血花》。

作为政治干部，李曦晨从不限于开大会、作报告去推动工作，而是经常和干部、战士谈心，把精力倾注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上。战士在战斗中负了伤，他安慰战士安心休养，争取早日回部队杀敌；干部、战士在战斗中立了功，他号召广大指战员向功臣学习，同时勉励立功的同志戒骄戒躁，争取更大的光荣；有的同志在工作中遇到实际困难或思想上有想不开的问题，他会具体帮助他们排除障碍，解开思想上的疙瘩。靠这种具体、深入细致的工作，李曦晨打开了干部、战士美好心灵的窗口，自觉为民族的解放、国家的复兴去战斗。

1939年9月，三支队成立独立团，随支队司令部、政治部机关行动，李曦晨任政治委员。当年12月10日，三支队司、政机关转移，李曦晨和他率领的独立团，在莱芜西周峪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近战。战斗中，秘书张九功不幸身负重伤，李曦晨奋不顾身前往掩护抢救，不料敌人一阵密集的子弹射来，李曦晨不幸中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7岁。战斗结束后，三支队首长和独立团的干部、战士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，将李曦晨烈士的遗体埋葬在苍松翠柏掩映的山麓。

李曦晨的爱人、战友王月村，对日军夺去了亲人的生命无比仇恨。她继承李曦晨的未竟事业，发奋工作。1978年9月2日，王月村到烈士生前战斗过的泰莱山区，挥泪写下《游泰莱怀故》的诗篇：

四十年前仲秋日，
曦晨将兵泰莱西；
千里艰险何所惧，
一片丹心抗顽敌。
披星戴月军行急，
相会只日又分离；
依依惜别眼相送，
切望归来胜利时。
夜阑倍觉寒光满，
明月伴君照征途；
莫道秋虫声凄惋，
英雄一去永不归。

（本文根据陈梅川、许云川、王翰西、郭川回忆文章整理）

相关链接·

杨三友越狱

□ 本报通讯员 王静 孙锐
本报记者 陈巨慧

杨三友(1907年～1984年)是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大马岱村人。1937年秋，卢沟桥事变后，杨三友参加抗日工作。1938年4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38年秋天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南下，留在杨三友家七八支枪，当时他任临淄县二区组织委员，就和几名同志利用这些枪建立起了临淄二区区中队。不久，临淄县委就以二区区中队为骨干成立了县大队。

这一时期，临淄地区基本上每个村都建立了党支部，有支部的村子都建立了农救会、青救会、妇救会等群众组织。截至1940年底，全县党员共发展到3000名，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战高潮。

1939年9月，清河平原上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“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”在大夫店成立。

1941年春，由于叛徒投敌，临淄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共产党员和干部骨干被疯狂捕杀，仅杨三友所在的大马岱村就有十几人被杀害。那时的临淄地区基本上成了敌占区，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。县委、县政府被迫转入广饶三区、博兴四区活动。

1942年下半年，杨三友等人返回临淄恢复、整顿、发展党组织，当时的条件仍很艰难。由于白天几乎没有立足之地，他们只得采取昼伏夜出的办法开展工作。杨三友等人先是对一些伪村长进行教育，争取他们抗日。在争取了不少伪村长的支持后，他们就以此作掩护，逐步把工作开展起来。

由于能够潜伏下来，有了开展工作的条件，杨三友就用熟人的关系找个别党员谈话，逐步把一些村子的党组织恢复起来。当时，日、伪军垂死挣扎，几乎天天进行“扫荡”，并在临淄和广饶交界处挖了一条大封锁沟，安设了岗楼，临淄在沟南，广饶在沟北，杨三友等人从广饶到临淄去开展工作，困难很大，风险很高。

1943年，临淄形势进一步恶化，革命斗争到了最为艰苦的年代。时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的杨三友在极端恐怖危险的环境下，依然往来于敌人腹脏地区，发动群众、依靠群众开展斗争。

1943年11月20日，杨三友在敬仲镇毛家屯村民崔秀英家主持会议，因该村伪村长向敌人告密，第二天拂晓他们被100多名汉奸包围。杨三友发现敌人后，当即在屋子里组织突围，往院子里扔手榴弹，敌人退到院子外面时，他们趁机从屋里出来转到了屋子后面。杨三友随即命令战士们向村外转移，自己却在突围中负伤留在了村里。

杨三友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刚隐蔽好，一名战士小周的棉衣烧着了，身上冒着烟找到了他。杨三友把小周安排在这个老百姓家里后，准备转移到别处去，就在他翻越墙头时被汉奸发现，不幸被俘。

幸运的是，汉奸并不认识杨三友，他自称是“八路”，叫钟平，同时质问汉奸：“你们为什么烧老百姓的房子，抢老百姓的东西，牵老百姓的牲口？”汉奸们无言对答。杨三友先被押到苇子河据点，后又被关押到临淄城监狱。杨三友入狱后，敌人几番对他审讯都没有得到任何信息。

监狱里共关押着50多人，分别关在3个房间里。益都县大队长陈明新因在狱中受饿，身体支撑不住，只能爬行。杨三友一进来，原先被关押的人都想知道外边的情况，要求他介绍外边的形势，杨三友就趁机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。

杨三友入狱的消息传到临南工委，书记孙鲁参决定请临淄县崔家庄朱大娘帮忙营救杨三友。朱大娘假扮成杨三友的老母亲，提着饭篮去监狱给杨三友送饭。刚到监狱门前，就被站岗的伪军拨到一边去了。朱大娘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俺儿子在这里坐牢，俺来看看他，您就让俺进去吧。”朱大娘边说，边从饭篮里摸出几个鸡蛋递过去。收下鸡蛋的伪军露出点笑意，挥挥手让朱大娘进去了。

朱大娘进了狱门，一见到杨三友，便抢着说：“孩子，我可见到你了，娘想你啊！”说着便簌簌泪下。杨三友心领神会，抱着朱大娘说：“娘，孩儿也想您！”难友们见“母子”相会，纷纷离开窗口，给两人有个说话的机会。

接上头之后，朱大娘经常到监狱看望杨三友，把党组织的指示传达给他，同时也把监狱中的情况反映给党组织。杨三友了解到这些难友中，有的是共产党员，有的是乡村干部，有的是抗日组织的负责人。为了保存这部分革命干部，党组织最终确定方案，指示杨三友组织越狱。朱大娘在送饭的时候分几次把剪刀、镰刀、铁片等工具卷在煎饼里带进监狱。

1944年4月8日晚上，杨三友指挥难友按照分工开始越狱，姚崇刚带领一部分难友守在门口、窗口，负责警戒工作；徐有仁带领两名难友负责在狱墙上打洞。另外，挑选了8名身强力壮的难友组成了越狱先锋队。夜里12点左右，徐有仁和两个打洞的难友用镰刀和钢锉沿着牢墙的砖缝撬砖打洞。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，监狱长前来查狱。杨三友急中生智，让难友把工具藏到尿罐里，巧妙躲过敌人的搜查后，徐有仁带领两个难友，紧张地继续在牢墙上打洞。狱卒从窗前走动时，负责警戒的难友即发出暗号，暗示打洞的难友停止工作，狱卒走过之后，又开始行动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总算有一块砖头松动了，徐有仁趁势把钢锉插进砖缝里，用力撬了撬，这块松动的砖头就掉了下来，其余砖头也就好挖了，牢墙上，很快出现了一个轮形的洞口。洞口挖开后，杨三友立即让徐有仁取出提前打造好的钥匙，将难友身上的手铐和脚镣全部打开，并指示大家不要乱动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自己率领8名越狱先锋队员首先冲出洞外，制服狱卒。接着杨三友指挥先锋队员分两组，分别沿着监狱墙嵴壁向门口冲去。守在大门外的两个狱卒，没料到背后有人扑来，还没来得及反抗，便被先锋队员拿下了。这时，杨三友立即命令难友们火速离开牢房，难友们按照指挥有秩序地从洞口钻出来。

杨三友越狱用的物品

杨三友

杨三友和难友们登上东面城墙时，党组织派来的武工队员早已等候在那里。杨三友带领难友在前面奔跑，武工队队员在后面掩护。当敌人追到淄河西岸时，杨三友和难友们早已不见踪影了。

杨三友出狱后到1946年期间，继续担任临淄县委书记。1949年春，随军南下去浙江，历任衢州市公安处长、浙江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长。